

古人的雁门情怀

□ 赵 威

山西代县边靖楼，万里长城第一楼，通高40米，楼上挂着中国最大的匾额“声闻四达”“威震三关”。登斯楼，代州古城尽收眼底。北方20公里外有古勾注山（雁门山）横亘在前，那是古代抵御北方民族的屏障。而雁门关就守在进出勾注山的咽喉上，如铁锁一般，只许雁过。

雁门关处在农耕与游牧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分界线上，自然会进入长城内外的文人笔下，所以，中国自古就有一种雁门情怀。其成因有三点。

一是雁门文化源远流长，内涵丰富，给历代文人缅怀历史、凭吊人物提供了素材。早在西周穆王西征时，对雁门关就有了明确的记载。战国时，赵武灵王为对抗北方民族设置了雁门郡，作为北方三郡之一（另有云中、代）。赵国李牧曾在此抗击匈奴，驻地在雁门关，如今在雁门关公主洞（王昭君等几位公主出塞时住过的窑洞，“出塞”就是出雁门塞）一侧，有李牧和历代20余位名将指挥作战的将军洞及李牧祠。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事件都与雁门关有关，如汉白登之围与昭君出塞、隋雁门之围与突厥之叛、宋辽分界线上杨氏一门保家卫国。

二是“天下九塞，雁门为首”。雁门关的军事战略地位极为重要，仅唐代在此就发生40余次战争，明与蒙古在此有30余次交锋，所以许多诗歌含有家国情怀和激励斗志的精神。“黑云压城城欲摧，甲光向日金鳞开。角声满天秋色里，塞上燕脂凝夜紫。半卷红旗临易水，霜重鼓寒声不起。报君黄金台上意，提携玉龙为君死。”这是一首乐府诗，写唐朝与藩镇之间在雁门一带的战争，作者是有“鬼才”之称的唐代著名诗人李贺，题目叫《雁门太守行》。19岁的李贺以此诗拜见韩愈，得到对方的赏识和举荐。雁门的军事地位催生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



词。再如“雁门山上雁初飞，马邑阑中马正肥”“朔雪飘飘开雁门，平沙历乱卷蓬根。功名耻计擒生数，直斩楼兰报国恩”“想关河，雁门西，青海际”……

三是这里一直是商旅贸易和民族交融的通道。战争走了，来的就是和平，雁门关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，有“早码头”之称。明代方逢时《塞上谣》对此有生动描写，可谓雁门情结中的代表作：“雁门东来接居庸，羊肠鸟道连崇崩。关头日出光瞳眈，于今喜见车书同。商旅夜行无春冬，南金大贝輶相逢，越罗楚练纷蒙茸。车频脂，马频秣，朝关南，暮关北。胡姬两颊如花红，入市时能歌贾客。”

元代统一长城内外，长城连同它的城关失去屏护作用，雁门关有了一个难得的风平浪静时期。此时，雁门出了一个有名的诗人书画家萨都刺。

萨都刺（约1272—1355），西域回回人，生于代州雁门（今山西代县）。祖上随蒙古铁骑征服西域各国有功，得以镇守云、代，定居雁门。元泰定四年，萨都刺以弱冠之年进士及第，应奉翰林文字，开始了宦游生涯。后升任南台御史，因弹劾权贵，累迁江南行台侍御史，晚年居于杭州。游走在外的一生，

催生了他的诗情，留下诗作近八百首。他还擅长书画，画作《梅雀》《陵阳台图》等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

生在和平年代的萨都刺，却写了《征妇怨》《题画马图》等许多反对战争题材的边塞诗，这是他的诗歌特点之一。“居庸关，山苍苍，关南暑多关北凉。天门晓开虎豹卧，石鼓昼击云雷张。关门铸铁半空倚，古来几多壮士死……男耕女织天下平，千古万古无战争！”这是萨都刺过居庸关时的思古之作。他身为非汉民族的诗人，一生却受汉文化的熏陶，诗歌也继承了唐宋边塞诗的传统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萨都刺的边塞诗中的边塞情结不是很突出，不再以战争和离愁为旋律，而是以更多的笔调抒写边塞风光和游牧生活，诗中充满了故乡情结。比如，他曾塑造了“燕姬”这一形象，在《京城春日》中这样描述：“燕姬白马青丝缰，短鞭窄袖银镫光。御沟饮马重回首，贪看杨花飞过墙”。“燕姬”是边塞诗中的一抹亮色，没有为战争与苦楚，添了一个邻家女孩的美好与浪漫，显然，这源于诗人胸中温柔的故乡情。

萨都刺的诗歌最能体现故乡情的当属“雁”的意象，他的诗集因

自己的生养地而取名为《雁门集》。“雁门”出自《山海经》“雁门山者，雁飞出其间”，传说每年春天，南雁北飞，口衔芦叶，飞到雁门盘旋半晌，直到叶落方可过关。雁在中国文化中有特殊的寓意，是文人之间的一种见面礼，比如孔子见老子的时候就带着雁；雁还是传递信息的使者，寄托文人的思乡之情，如“鸿雁传书”“雁逝鱼沉”；雁声凄厉，有凄惨悲凉之情。在《雁门集》中，涉及“雁”的多达48首，如“潇潇风雨客心孤，且尽尊前酒一壶。夜半酒醒愁又到，一声白雁下平湖”，写出了萨都刺赴任所途中，夜宿醉酒，一声雁叫令其倍感孤独，涌起的思乡之情；在其《寄舍弟天与》中有“鸿雁飞南北，关河隔弟兄”的诗句，写的是思念手足之情，当他目睹灾荒中民众陷入深深疾苦中时，写下了《鬻女谣》，“传闻关陕尤可忧，早荒不独东南州。枯鱼吐沫泽雁饥，嗷嗷待食何时休”，表达了忧国忧民之情。



官渡之战前夕，面对袁绍的主动进攻，曹操面临极为严峻的战争形势。遥想袁绍当年，“有威容器观”“为人宽雅，有局度，喜怒不形于色”，不但地广兵强，在社会上有极高的声望，而且在百姓的心中是非常有德政的一方诸侯。当此之际，郭嘉为曹操献上著名的“十胜十败论”，从激励曹操必胜的角度出发，也暗含对曹操的劝勉，提出了十个方面应当实现的战略安排。“十胜十败论”不但可用于判定袁、曹的官渡对决，也可用于评判曹操的一生功过。

道胜

“绍繁礼多仪，公体任自然”。繁礼多仪即讲排场、架子大，程序多、内容少，修饰多、务实少，虚伪多、诚恳少。人情莫不喜自然而厌繁缛，繁缛的礼仪不惟增加运行成本、降低办事效率，也疏远上下级关系。郭嘉投奔曹操前，曾在袁绍帐下呆过数月，虽然袁绍对他格外礼遇，但他还是毅然离去。袁绍喜欢繁文缛节，有一次回汝南老家，有很隆重的车队，阵势非凡，快到郡界时，他因怕受到同乡名士许劭的批评，就说“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？”就把其他车辆打发走，自己装模作样、轻车简从地回了家。曹操则不然，他胸怀大志，乐观包容，坚韧不拔，藐视一切困难，具有吞吐天下的英雄气概，完全不屑于繁缛的礼仪。许攸投奔曹操时，他已经休息了，但他跳出迎之。他“每与人谈话，戏弄言诵，尽无所隐，及欢悦大笑，至以头没杯案中，肴膳皆沾污巾帻”。《三国演义》中描写了他五十四次大笑的场景，许多都是在非常庄重或者生死攸关的场合，这虽然算不得正史，但也十分形象地刻画了他的性格。

义胜

“绍以逆动，公奉顺以率天下”。“以逆动”即袁绍不从民意，不拥戴汉天子，以一个反对汉天子权威的军阀面目出现。“奉顺”即曹操顺应民意，拥戴汉天子，以汉室的权威治理天下。东汉末年，汉室虽已倾危，但在百姓心中依然是正统，刘备的民望一直很高，与他打的兴复汉室的旗帜也有关系。毛玠、荀彧都看出若要取得胜利，需要顺应民意，“宜奉天子以令不臣”，这条建议立即为曹操采纳并立即实施。在曹操行动之前，沮授也洞察此理，力劝袁绍早行“挟天子而令诸侯”，否则将被其他人抢得先机，结果袁绍不纳。当此之时，曹操因“奉顺”而以义胜，只此一点就在诸侯之中取得了道义制高点。但是，曹操在后期加封国公、受九锡，并未得到民意的普遍拥护，连他的首席谋士荀彧都表示反对。荀彧认为曹操应该怀忠贞之诚、爱人以德来匡扶汉室，结果被曹操逼死，荀彧的六子荀颢后来成为司马氏篡魏的得力干将。曹丕咸汉献帝禅位后，对天下人说“尧舜之事，吾知之矣”，明白告知天下人谁有实力谁就可以不顾大义篡位为帝。这句不讲政治的蠢话，动摇了曹魏政权的政治基础，后来曹魏政权被司马氏“以其之道还施彼身”。当初郭嘉判定的义举，曹操不再坚持，失去了义，则人心背离。

治胜

“桓、灵以来，政失于宽，绍以宽济宽，故不摄，公纠之以猛，上下知制”。东汉末年，政治黑暗，纲纪大坏，法令不行。当此之时，袁绍的治下法令宽和，有令不行，有禁不止。曹操则施行申不害、商鞅的法治思想，强调“刑，百姓之命也”，“拨乱之政，以刑为先”，面对散乱的政治秩序，审时度势，以猛纠宽，制定并实施严格的法令，不官无功之臣，不赏不战之士，曹魏政权基本实现了赏罚分明、令行禁止，打击豪强、杜绝朋党，形成了清明的局面。曹操出任济南相时，发现青州各郡修了许多刘邦孙子刘章的祠堂，仅济南就有六百余座，祭祀活动大行，社会风气日益奢靡，百姓却越来越穷。曹操对此重拳出击，将这些祠堂全部拆毁，不许官民拜鬼拜神，让百姓安心从事农业生产，济南一时“政教大行，一郡清平”。曹洪有一个宾客在许昌违法乱纪，被许昌令满宠逮捕，曹洪向满宠写信求情未果，于是告到曹操那里。曹操召见满宠，满宠预料曹操可能会释放这个宾客，于是提前执法，将那个宾客诛杀。曹操得知后，非但没有生气，反而高兴地说：“负责任的官员就应该这样办！”

度胜

“绍外宽内忌，用人而疑之，所任唯亲戚子弟，公外易简而内机明，用人

用郭嘉『十胜十败论』审视曹操一生功过（上）

□ 杨奎

无疑，唯才所宜，不间远近”。袁绍虽然军力雄厚，手下有一流谋臣沮授、田丰和当世名将颜良、文丑、张郃，但是，他内心却怀疑这些部下，最信任的还是自己的亲戚子弟，在他那里，贤良者得不到信任重用，不贤良者也没有被分辨匡正。荀彧说袁绍“布衣之雄耳，能聚人而不能用”，郭嘉也说他“欲效周公之下士，而未知用人之机”。袁、曹二人起兵之初，曾有一段高下立判的对话，袁绍问曹操：“若事不济，则方面何所可据？”曹操反问袁绍，袁绍说：“吾南据河，北阻燕、代，兼戎狄之众，南向以争天下，庶可以济乎？”曹操说：“吾任天下之智力，以道御之，无所不可。”曹操的用人之道有目共睹，他三次发出《求贤令》，提出“唯才是举”，强调贤才的重点是才干，“若必廉士而后可用，则齐桓其何以霸世？”官渡之战胜利后，他将部下与袁绍的秘密通信全部焚毁，显示出超乎寻常的包容度量。但是，曹操对人才的把握也出了很大的偏差，他以己之短忌人之长，“诸将有计画胜己者，随以法诛之”（轻害士人，天下非之），诛杀的良臣良将良才为数不少，如崔琰、高顺、孔融、华佗，许多英雄离他而去，成为了他的对立面。

谋胜

“绍多谋少决，失在后事，公得策辄行，应变无穷”。官渡之战的战史也是袁绍的拒谏史，他手下谋士提出的一系列正确建议都被他逐项否决。曹操面对问题，能听得进部下的不同意见，据此改变自己原先的主张，而不顾及自己的颜面。他具有优秀决策者从善如流、“唯道理是从”的忘我胸怀，能够在不同决策方案中作出选择，不会让下面的人迎合他的意图，也不会因智谋不从己出而不予采纳。曹操北征乌桓得胜归来后，召见之前反对进军的人，这些人都非常害怕，担心要受到处罚，不料曹操却重重赏赐了他们。曹操对他们说：“孤前行，乘危以侥幸，虽得之，天所佐也，顾不可以为常。诸君之谏，万安之计，是以相赏，后勿难言之。”但是，曹操在后期的几个重大决策却未能做到“谋胜”。刘备刚入川时，司马懿和刘晔都提出应当立即南下，趁蜀人心未附，可以传檄而定，而如果现在不取，等刘备站稳脚跟则后悔莫及。但是，曹操却作出了和光武帝刘秀截然相反的决策，“人苦无足，既得陇右，复欲得蜀？”言竟不从。曹操有雄霸之心，在此关头却失去了一往无前的进取心。赤壁大战前夕，贾诩提出不应南下，而应当安抚百姓，等待时机，结果曹操骄傲自满、过于轻敌，没有听从贾诩的建议。曹操在此战略决策上的一招不慎，导致了三国鼎立60年的局面。



秦变五百年



□ 崔 庆

秦是中华历史上的一段华章，聚六合而成一统，立政法而启百代。据说英文中代表中国的单词China，发音就来自于“秦”。什么是秦？是什么力量让一个西陲小邦，成为雄视天下的中央之国？应时而变、奋斗不止可能是最根本的原因。

四战之地

后世称秦为形胜之国，外有四塞之险，内有关中之富，为天府之地。好像秦占尽了天时地利，由其完成统一大业，是理所当然的。其实，天上从来没有掉过馅饼，形胜之国是秦数百年不懈努力的成果，而不是原因。

秦人原来是“弼马温”，为周朝放牧马马，地位卑微。但秦人干一行爱一行，养马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，被周朝授予西陲之地，大约是现在甘肃南部的一小片土地，还几乎是一张“空头支票”。西陲远离中原，是戎族的天下，周朝尚且无力伐戎，秦要在此立足，谈何容易。数代秦君前赴后继，浴血疆场，终于在周朝已经放弃的地方上

扎下根基。此后，秦立于四战之地，和戎族反复拉锯，和三晋、强楚几番周旋，逐步占据关中，才有了被称为“四塞之险”的发展基本盘。

国小志坚

古今中外，每一次国家崛起，几乎首先都是意志的胜利。齐景公曾经请教孔子，为什么秦穆公可以称霸？孔子认为，“秦国虽小，其志大；处虽僻，行中正。身举五羖，爵之大夫，起累继之中，与语三日，授之以政。以此取之，虽王可也，其伯小矣”。孔子生活的年代，秦是景公、襄公、惠公、悼公先后统治的时期。从这一连串的谥号可以看出，那时秦国正处于漫长的低潮期，如坠万古长夜，不知黎明在何方。但是，孔子从历史发展的角度，依然给予秦国极高的评价。他认为秦穆公塑造了坚强的国家品质，国小志大，求贤若渴，人尽其才，称伯不算什么，称王也无厚非。

在复杂的竞争环境中，秦人沉淀出血性刚勇的品质。秦国早期君主秦仲，为周朝讨伐西戎，战死疆场。秦仲的长子长孙世父，为报国恨家仇，甚至舍弃王位，专心讨伐西戎，可谓慷慨悲歌。秦国中期君主献公，在外流亡30年，冒死归国，可谓百折不挠。秦国后期君主昭襄王，长平之战，亲临南阳，倾国而出，以命相搏，可谓血脉贲张。如果追溯秦人远祖，蜚廉、恶

来父子身为商王朝近卫军团的统帅，力战而死，这就不难理解秦人血性成就了秦国功业。

秦人不仅有勇，而且有志，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。战国初期，魏国最先变法，也最先崛起，并对秦国形成了战略压制。可惜魏文侯的伟业在魏武侯、魏惠王的自得自满、一误再误中烟消云散。相比之下，秦穆公的河西之梦，300年后还在秦孝公心中激荡，而求索家国崛起之梦，一追就是500年。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宏大志向，也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。“地方五千里，带甲百万”的楚国，在顶层设计中从未考虑过并吞天下，只是满足于偏安一隅；拥有山海之利、地形绝佳的齐国，在百舸争流的年代沉迷于安逸生活。楚、齐有比秦更为显著的优势，最终却目送秦国完成大业。

变与不变

意志坚定还需要与时俱进，变与不变相互促进，不变的是家国之梦，变的是兴邦之法。秦之变稳中求进、异彩纷呈。

襄公、穆公、献公、孝公、昭襄王等秦国的带路人，都是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，先行先试，善作善成。襄公护送周平王东归，兴兵伐戎乃至于浴血疆场；穆公三置晋君于东，拓地千里于西；献公迁都栎阳，国君镇边，安危度外；孝公《求贤令》震古烁今，取信于民，变法图强；昭襄王远交近攻，